

宁夏革命与建设史

宁夏社会科学院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革命与建设史

宁夏社会科学院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革命与建设史 / 宁夏社会科学院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7-05548-8

I. ①宁… II. ①宁… III. ①革命史-宁夏 ②区域
经济-经济建设-经济史-宁夏 ③社会发展史-宁夏
IV. ①K294.3 ②F1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357 号

宁夏革命与建设史

宁夏社会科学院 编

责任编辑 张燕宁 梁 芳

特约编辑 廖 周

封面设计 杨祎霞

责任印制 杨海军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4416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600 千

印 数 1000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548-8/K·790

定 价 8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宁夏革命与建设史》

编写组

学术顾问 霍维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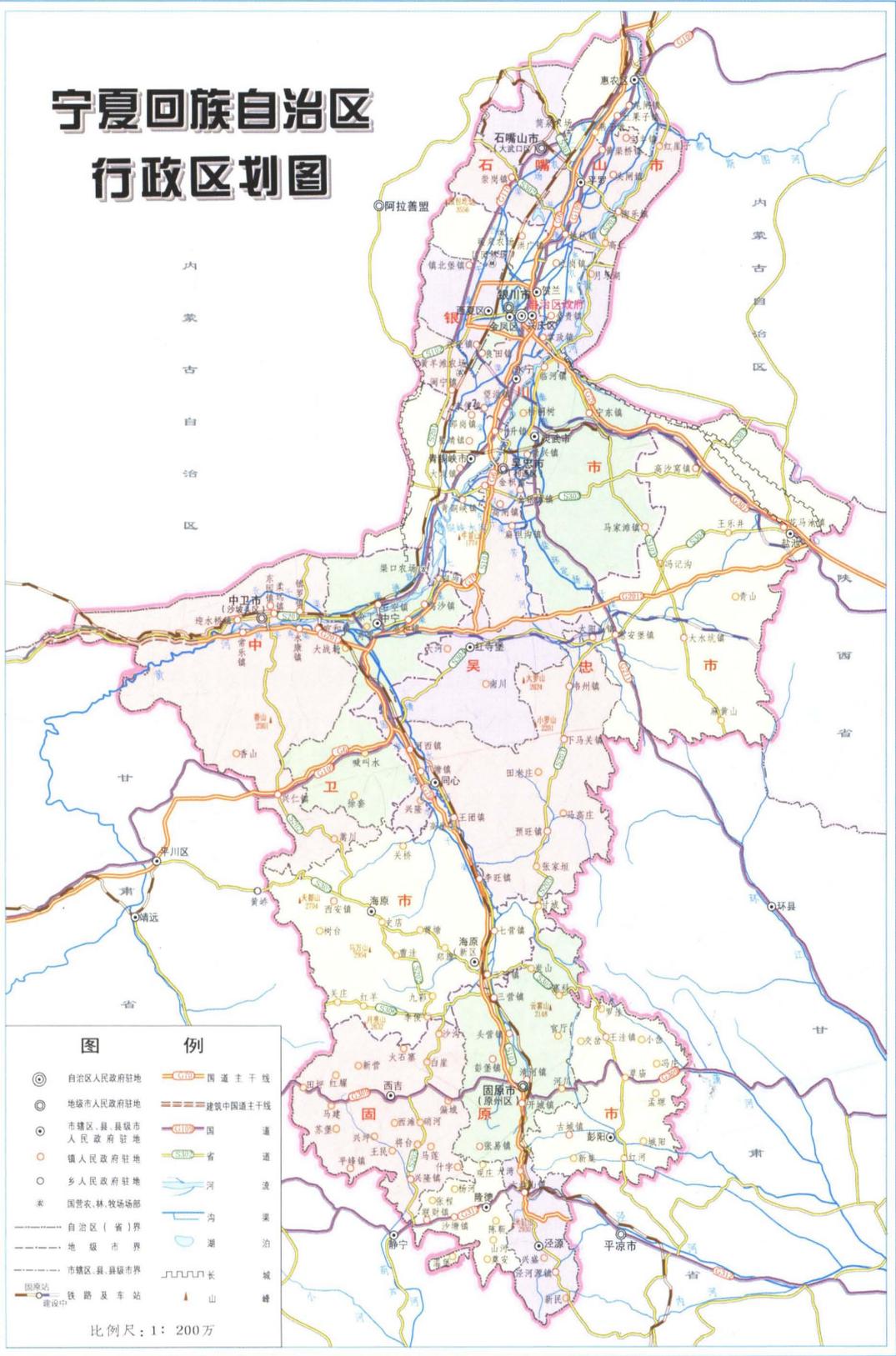
编写人员 霍维洮 宋志斌 张海晏 何新宇

陆维成 郑彦卿 许芬 张万静

马宝妮 陈朝辉 廖周 郑晨阳

图片统筹 张万静

宁夏回族自治区 行政区划图



审图号:宁 S(2010) 03号 资料截至 2009年年底

宁夏国土测绘院 编制

前 言

革命史,乃革命运动发展史。以研究范围划分又可分为全国的革命史和地方区域的革命史。这部书当然属于后者。

革命史讲革命运动。“革命”一语本质上属于近代范畴。“革命”一词虽古已有之,如“汤武革命”“玄武门革命”云者,但“革命”成为专门的政治概念,特指反映新的经济关系要求而兴起的政治运动,却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17世纪以后,英国、法国、美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一批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运动的著作中,使用“革命”概括其性质,“革命”遂成为流行的政治概念。马克思更将经济关系、阶级划分和政治革命相联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的本质内涵。

中国人广泛使用“革命”一语,始自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和泛滥。自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一词如烈火燎原,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可以逃过革命的入侵。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经济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有一个国家如同中国那样,在20世纪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革命。”^①20世纪之于中国,完全是革命的世纪。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也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革命不再是某一特定经济关系的要求,而是天道的启示;革命不仅是制度变革的追求,也是全新道德价值实现的道路。章太炎不是说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用之良药!”^②革命话语不再局限于政治精英,而成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流行概念。

然而,我们这样一个热衷革命的国家,对革命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科学地揭示革命的内容和革命在中国的演化形式尚未完成。这当然不是设立几个研究项目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总结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历史事实和面貌,就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同时要看到,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经济、社会不平衡是基本国情。革命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开展,其具体的条件、内容和面貌不尽相同,需要分别研究。革命运动在各个地

^①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60页。

区的具体表现构成了全国革命的总体内容。不了解区域性革命运动的特殊内容,就不可能产生完整准确的中国革命史。

宁夏地区在近代以后,其社会特殊性日益突出。人们都熟知宁夏是少数民族区域,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是游牧经济,而宁夏自古农耕经济发展甚早。因此,宁夏是一个农耕型少数民族区域。从经济形态看,这里与中原有更大的同质关系,这是宁夏革命运动与全国形势同步发展的客观基础。民族性则主要体现在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族群构成上,反映在政治上则与这个地区主导性民族的历史阶段有紧密联系。大体而言,西北回族社会在明、清有长足发展,表现在人口增长、经济实力提升、组织发展迅速等方面,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发展促成了政治要求的趋向。保守的清政府与西北回族社会的变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从乾隆朝后期开始,西北回族不断兴起反清斗争,这场运动最终演化为回族军阀政治。宁夏自辛亥革命以后,马福祥家族确立了统治,这是清末至民国宁夏民族关系演化的线索。

民族关系在某些历史阶段可以主导社会政治,但它不可能永久地掩盖阶级关系。因此,随着马家军阀统治的持续,阶级关系日益暴露,包括回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也逐渐表现。另一方面,宁夏社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受到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宁夏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两种力量推动了宁夏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其典型者如“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的历史创举,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在宁夏的表现,同时又是宁夏回族社会革命意愿的表述,准确地反映了宁夏革命的特点。每一民族的政治追求,只有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才有广阔的前途,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革命史往往能更集中地反映人们对社会前景的认知,通过革命史,我们能体会每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追求。

从编写体例与内容看,革命史与地方史、中共党史等有交叉之处。地方史是一个区域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记述;中共党史则是某区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历史。从内容的范围讲,地方史的主旨是研究社会变化,包含着革命史和党史的内容,但它更多的是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党史则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主线,更为专门。革命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在上述二者之间,它较党史为宽,既包括中共党史,但也记载其他的革命运动以及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记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新时期的革命历程。所以,《宁夏革命与建设史》是和宁夏地方史、中共宁夏党史一起,充分展现宁夏地区的历史社会面貌,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霍维洮

2013年3月25日

编辑说明

一、《宁夏革命与建设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宁夏近现代史。

二、本书记载的范围:以 2004 年年底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为记载范围,对历史上划进划出的地区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三、本书的时间断限:本书的上限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下限至 2010 年年底,第十二章为了记述的完整性下延至 2012 年 10 月。

四、本书的数据以自治区统计局编写的统计资料为准,数字使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文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现行计量单位为准。

五、本书文字和图片资料除注明外,其他均来源于自治区档案局、宁夏图书馆、各市、各厅局档案资料,《宁夏日报》《甘肃日报》刊登的资料和其他公开出版物的资料,力求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以便于查阅使用。

六、有的历史事件为了保持历史原貌、资料的完整,不做评论,冤假错案加括注。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宁夏社会与民族运动	1
第一节 清朝在宁夏的统治和宁夏社会矛盾	1
第二节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	9
第三节 宁夏人民反对内外统治的斗争	23
第二章 宁夏的民主革命运动与军阀统治	30
第一节 宁夏各族人民响应辛亥革命	30
第二节 军阀政权对宁夏的统治	38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在宁夏早期的革命斗争	61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宁夏的传播	61
第二节 中共宁夏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66
第三节 红军长征在宁夏的活动及其影响	79
第四节 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活动	85
第四章 宁夏地区的抗日斗争	106
第一节 宁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06
第二节 中共宁夏工委的革命活动	111
第三节 盐池县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14
第四节 固原地区的革命活动	119
第五章 宁夏的解放与地方政权的建立	123
第一节 解放战争中的宁夏	123

第二节	中共在宁夏的活动和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	125
第三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	138
第四节	宁夏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151
第六章	新政权的巩固与经济建设	156
第一节	巩固新政权与恢复国民经济	156
第二节	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	171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82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的全面实施	188
第七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194
第一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过程	194
第二节	自治区成立前后经济建设	204
第三节	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前进	223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244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44
第二节	全面内乱的出现	248
第三节	军队稳定局势的工作	255
第四节	“斗、批、改”运动	260
第五节	整党建党	277
第六节	抵制极“左”思潮及“批林批孔”运动	281
第七节	1975年的整顿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292
第八节	曲折发展的经济	299
第九章	宁夏社会发展的伟大转折	306
第一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306
第二节	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	311
第三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	320

第十章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334
第一节 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334
第二节 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	343
第三节 扶贫开发向纵深发展	357
第四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365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373
第一节 贫困人口持续减少	373
第二节 工业园区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泉	379
第三节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顺利推进	383
第四节 对外贸易实现新跨越	388
第五节 县域经济开拓奋进	390
第六节 城市化建设扮靓宁夏	392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96
第一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396
第二节 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三化”战略实施	403
第三节 实施沿黄经济区建设	406
第四节 建设和谐富裕的新宁夏	413
大事记	424
参考文献	529
后记	533

第一章 晚清宁夏社会与民族运动

第一节 清朝在宁夏的统治和宁夏社会矛盾

一、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

清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实施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清初,随着各地反清斗争的平息,清政府在西北的地方统治逐步确立。清政府改变了明代宁夏的卫所制度,废除卫所,改建郡县。今宁夏北部设宁夏府,属甘肃省,下辖灵州、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宁夏南部设固原州和隆德县,属平凉府。

宁夏地方行政建制变化的客观基础在于,清朝满洲贵族与蒙古上层结成了稳定的联盟关系,满蒙联盟是清朝的基本政策。宁夏以北的蒙古族势力已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威胁,宁夏地区的军事意义逐渐减弱。因此,明朝在宁夏具有强烈军事特点的卫所制度已不合于形势。这实际上表明宁夏地区经过明代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稳定的农耕区域,以民户为基础的州县制进一步确立。

但是,西北地区毕竟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复杂,屡屡兴起民族运动。因此,清政府特别在宁夏设驻防八旗,“设镇守宁夏等处将军都统”^①,其长官称为“宁夏将军”,领下属官兵三千余人。^②初期,满营设于宁夏府城东北五里(今银川市红花乡满春村),乾隆三年(1738年)地震被毁,改建于府城西(今银川市新城)。

绿营兵建制在宁夏设镇,隶属于甘肃提督衙门,而陕西提督长期驻扎固原。因此,宁夏南北所驻绿营军队数量较多。

①《朔方通志》卷11。

②《八旗通志》卷28。

清前期,宁夏社会较为稳定,清政府积极倡导农业垦殖。宁夏巡抚黄图安在《条议宁夏积弊疏》中提出整顿兵饷、渠工、驿递、军训等八项改革措施^①,其中“化兵为农”和“变兵为民”措施意义重大,一些兵丁转为农民,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宁夏地方政府亦积极恢复水利,称“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其事最要”^②。官府组织农民,先后开凿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开辟耕地万顷。宁夏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繁荣。文献中记载:“中卫、灵州、平罗,地近边,畜牧之利尤广。其物产最著者:夏、朔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③在此基础上,宁夏的商业、交通均有所发展。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尤为突出,据统计,清嘉庆年间,宁夏府户口数达到 214992 户 1392815 人,较之 200 年前超过 10 倍。人口空前的急剧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生产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的,它所能承担的社会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入 19 世纪后,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逐渐减缓,转入了生产停滞和萎缩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利设施的失修与废弛。宁夏地区属于中原农耕区与北方牧业区的交界处,雨量稀少,气候干旱,其北部平原的农业依赖黄河水利灌溉,生产条件较好,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作物,产量比较高,为西北富庶之区。但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各渠道均为人工开凿的土质工程,沉沙淤积与堤岸毁坏十分普遍,需要逐年修整,而这项工程非分散的农民所能完成,它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组织才能进行。清前期,政治较有作为,于农业也有所关心,水利尚不致过分废弛。雍正八年(1730 年),宁夏水利引起雍正皇帝的关注,特诏谕称:“宁夏地方万民衣食之源在于大清、汉、唐三渠之水利。定例每年疏浚修理,使民田得沾灌溉。闻历年专司之员疏忽怠玩,以致闸道堤岸逐渐损坏,时有冲决,渠身淤泥填塞,日见浅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为尤甚,近来其口过低,其梢过高,水势不能逆流而上,多误小民耕种之期……”^④乾隆后期也因宁夏水利往往失修,特令“嗣后每年培浚,请派府佐、州、县春分前赴各渠点检料物,清明动工,立夏报竣。飭道、府水利同知督办,如有玩误,一并参处……各渠口拨正闸水手一、厅役一,住宿防守”^⑤。嘉庆以后,随着宁夏地方吏治败坏,

①乾隆《宁夏府志》卷 18《艺文志》。

②乾隆《宁夏府志》卷 8《水利志》张金城按语。

③乾隆《宁夏府志》卷 4《地理志》。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 6《田赋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清高宗实录》卷 1264。

水利不能督修,且成为污吏中饱的渊藪。嘉庆十七年(1812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报,宁夏各渠“历今二十余年,黄水冲刷日甚,堤岸大半溃裂,淤垫日深,民田难资灌溉,以至连年成歉歉薄,民力实形拮据”。因所需经费甚多,民间难以承办,“各渠民纷纷具呈,以民力不能修办,恳请照例借项赶修,分年征还”^①。宁夏水利二十余年无人过问,农民被迫向宁夏道台吁请借官款修渠。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日亟,无暇顾及地方政治,宁夏水利便无人过问,水利的废弛日甚一日。

灾害频仍。宁夏南部山区农业没有水利灌溉设施,屡遭旱灾;北部虽有黄河灌溉之利,农业状况比南部较好,但也经常受霜冻、冰雹、雨涝等多种自然灾害侵袭,加上黄河堤岸失修,两岸农田常被冲毁,农业经常歉收。据《清实录》记载,1801年至1850年的50年间,宁夏南北不同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就有39个^②,有灾年份占总时间的78%,足见灾害之频繁。今固原地区、盐池、中卫、灵武等旱耕区遭灾较多,且灾害严重。这些地区“多半山田旱地、风高土燥,全赖雨泽庆时,禾苗始能长发。兼之地气苦寒,秋田于夏至之前必须播种,非若他省麦收后尚可再种秋禾”^③,因此春天受旱,全年遭灾,而夏秋又屡有雹、霜灾害,农民一年劳作,往往收成无几。1810年,宁夏、陇东春天大旱,固原、盐茶、隆德、中卫、花马池等24厅州县“夏禾均已被灾,其秋禾杂粮或得雨较迟,未及补种,或虽补种,尚未长发”,而入夏后,固原、隆德、灵州、花马池又遭冰雹袭击,造成大灾。“被旱灾民缺水乏食,出走四方。”当时的陕甘总督那彦成派员勘察灾情,连续向朝廷奏请拨粮款赈济灾民,并于放赈之前先在各地设粥厂以为应急。“每月开销,大口粮五合,小口粮二合五勺”,煮粥救济。该年10~12月放银粮赈济,固原、盐茶、隆德、灵州、中卫、花马池受赈灾民共1010480人。^④这样才勉强度过了一次严重的灾害危机。1853年,“宁朔、宁夏、灵州、平罗、中卫等州县因夏秋暴雨,山水陡发,渠流泛滥,淹没田禾,民房并乡仓分储粮石,人畜均有淹毙,复有被雹之处,情形较重”^⑤。水、旱、雹灾以外,其他灾害也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危害。1852年五六月间,中卫一带“连次地震,经……查明,居民房舍震倒二万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三百余口,受伤者四百余口……居民粮食、衣物、牲畜亦多被压没,糊口无资”^⑥。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每遇灾害,人民往往流离失所。

①《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24。

②见《清实录》嘉庆六年至道光三十年。

③④《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21。

⑤《清文宗实录》卷104。

⑥《清文宗实录》卷64。

土地兼并严重。生产条件的破坏与自然灾害,致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从而给官僚、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提供了机会。每遇灾荒,农民“田禾未收,粮价腾贵”,不仅贫困之民典当田产,“即素有营生之户亦苦于贵余,度日维艰”^①。官僚富豪乘机巧取豪夺,大批自耕农沦为无田游民。如宁夏将军旺沁班巴尔“倚恃将军职任,护庇属下人等欺压平民,争占地界”^②。有的官吏“将(农民)畸零地亩指为隐垦私开……以致民力不支,流离潜匿”^③。农业生产因此遭到严重损害。

二、民族矛盾的尖锐

政治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不治之症。宁夏地方政治的败坏除封建社会一般原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清统治者视宁夏为“武备”区,而非“文治”地区。“诸凡建设,或因或创,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④清朝几次用兵新疆,宁夏为军事后备区域,征发粮草、兵夫为宁夏的主要任务。清中期以后,西北回族连续反清,进一步刺激清政府强化宁夏的军事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清朝在宁夏施政以武备为主的传统,即重视武装控制人民而忽略地方建设和文化事业。宁夏不仅驻军很多,且带兵之武将集中。北有宁夏将军率八旗军驻满营和宁夏镇总兵驻府城,南有陕西提督驻固原,而驻扎各地之中下级将领更是难以历数。这些武将往往少文无识,清廷对他们更为纵容,因此肆意横行,欺压百姓,使宁夏政治恶化。第二,历任宁夏将军及宁夏道、府、镇的官员大多数是满洲贵族,而且很多是皇帝的“特简”^⑤官员。他们恃特殊的身份和皇帝的恩宠,大胆妄为,加剧了宁夏政治的腐败。如道光时宁夏将军和世泰、副都统存华被查出接受下级克扣兵丁银饷及各项工程费用14400两^⑥。他们“片传佐领于月放饷银及马料尾零变价内按名摊扣,又违例接受生辰、婚娶银两”^⑦,而这些一、二品大员“俱系简任”官员。

黑暗的吏治环境,造成宁夏贪污案层出不穷。乾隆时揭发甘肃贪污冒赈案,总督以下省道府州县官因贪污被正法、流放者102人^⑧。宁夏知府、固原知州、灵州知州、平罗知县、宁夏知县等均属案内之犯。至道光年间,贪污案又屡屡揭发。“固原州知州陈栋接受前任

①《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21。

②《清高宗实录》卷1368。

③《清文宗实录》卷11。

④(清)左宗棠:《请陕甘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疏》,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3。

⑤特简,指皇帝对官吏的破格选用或在特定范围内选用某些官吏。

⑥《清宣宗实录》卷323。

⑦《清宣宗实录》卷325。

⑧杨怀中:《十八世纪的甘肃冒赈案》,载《回族史论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交代,仓库两项各亏短数万;中卫县知县艾椿年接受前任交代,亏空七八万;道光八年(1828年),杨遇春将藩库存银四十余万两,发交州县采买谷石,该提督阅兵时,亲见各州县将预卖之项多半亏短……”^①1851年,“陕西(甘)总督琦善之胞弟琦龄前在固原州、安定县各任内,亏空甚巨,谎报完缴,率请开复,令各属代为弥补,以致无处不亏。宁夏亏数最多……”^②贪污已成为宁夏官吏的普遍作风。赋税征收,胥吏任意上下其手。官员“办理开垦,意在见长”,谎报田亩,“其实并无其地,民间受累无穷,地方官枉得钱粮处分”。而“发商生息,为累病民之最甚者”。官员将官银借贷商人,坐取高息。“道府与州县,猫鼠同眠”,其盘剥之术,连历管钱粮的官僚亦叹为:“变幻离奇,不可思议。”^③

民间资源,官府视为利源,竭力把持垄断。宁夏水利灌溉,官府攫为己有,任意敲诈民钱。“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系冗员,书吏籍坝水摊钱,侵渔人已官吏视为利藪。而平罗县之灾下游者,水不到梢。吏胥既缘以为奸,民田复因之受累。自前道和祥将民间摊倾之钱,尽交道库,赢余亦为独得;厅中官吏,何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支使,遂又有重派分肥等弊。”^④如此层层加派,农民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产积极性和再生产能力逐步丧失。

盐业为宁夏盐池地区百姓的重要生产行业,清朝对此项利源实行官营,设盐捕厅于灵州惠安堡,为管理盐业生产和专卖机构,所产之盐由户部分配各地“盐引”为凭,由指定的商人行销,当地人民不得生产和销售食盐。由于官府经营不善,盐课沉重和官吏中饱,所产之盐成本过高,盐商往往亏损。及至清后期,盐区百姓自行生产,私自贩盐者日益增多。私盐与官盐相竞争,形成“私贩充斥,官盐不能畅销”的局面。官盐生产难以维持,私盐生产已成难以逆转之势,曾有官员鉴于此情况,奏请清廷放弃官营食盐,许民间生产、贩运,官府只需“设局收税”,但陕甘总督及清廷户部反对此议,坚持官办,命令各地“文武各官严缉”私盐^⑤。官府与民争夺盐利,严重地损害了宁夏盐业的发展,私盐被严禁,造成人民生产萎缩和生活贫困。

鸦片战争中的巨额军事费用和对英赔款,在战后都被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摊入地丁赋税一并征收。这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宁夏百姓负担更为加重。官府压榨,自然灾害,宁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残酷环境中艰难度日。那彦成曾指出当地“民鲜盖藏,丰收之年少,歉收之年多,一遇水旱灾伤,不能不筹议赈恤。办理既多,为日又久,不肖官吏熟于其事,

①《清宣宗实录》卷174。

②《清文宗实录》卷27。

③④(清)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126页。

⑤《清仁宗实录》卷76。

不恤灾民之苦,转视为牟利肥己之端”^①。灾荒之年,官府课税征求如故,民间无力交纳,遂形成宁夏各地赋税“积欠”的现象。逃亡人丁所欠赋税,均摊给当地“活口包赔”,故“积欠”之额有增无减,居民“年年输纳,竟为定例”,农民不堪赔累,“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②。

人民流亡是对封建剥削的消极反抗,它推动社会走向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是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表现。由于封建军事镇压势力的强大,宁夏人民还没有形成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运动,但零星的反抗斗争已经出现。道光年间,官府虚报垦荒地亩,逼民纳税,“州县催征,鞭扑严急。百姓鸠聚数千人,赴藩司衙门,将农具呈缴,不愿为农,器与屋齐,喧哗雷动,名为垦恩,其实欲与藩司为难”^③。1859年,“宁夏口外匪徒乘间肆扰”,往往持械反抗官兵。清廷命令宁夏镇总兵会同阿拉善蒙古兵巡查,于各关卡严密稽查,“倘有内地民人私行出入,形迹可疑者,立即严拿审明治罪”^④。这些所谓“匪徒”多是由宁夏等处流落至阿拉善旗之流民。为维护封建秩序,1852年陕甘总督舒兴阿特制定办理保甲章程八条,要求保甲编户:“宣示教化,互相劝诫”,“各境汉奸宜协同侦缉”^⑤。这也反映了宁夏及甘肃社会逐步走向动荡。

阶级矛盾激化的另一表现是清军兵丁闹事,宁夏清军风纪败坏,官长营私舞弊,士兵漫无纪律。“固原提督胡超克扣兵饷,署办戏装、置汰名粮、蓄养优伶……”^⑥士兵心怀不满,受检阅时行动迟缓,“校场漫无纪律”^⑦。鸦片战争中,宁夏军队调往浙江、天津等地作战,伤亡甚多,加上军饷减少,士兵生活更为困难,因屡有兵丁哗变之事,并与百姓反抗相联络。1856年,“宁夏等处兵丁因请饷滋闹”^⑧。士兵“时有出伍辞粮,阳为求饷,阴谋鼓噪之事”。这种现象已十分普遍,“该管官亦无如何”。兵将为“匪”,清廷认为:“设兵无以为养,多兵反足为害,若不及时裁冗,恐有尾大不掉之患”^⑨,决定裁兵三分之一。

清中叶以后,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西北社会内部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这一历史

①《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21。

②《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7。

③(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页。

④《清文宗实录》卷281。

⑤《清文宗实录》卷51。

⑥《清宣宗实录》卷281。

⑦《清宣宗实录》卷442。

⑧《甘肃全省新通志》卷301。

⑨《清文宗实录》卷324。